

经济的人性一面

普拉卡什·洛嘉尼对乔治·阿克洛夫的采访

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预言，经济学正在登上社会科学的皇后宝座。他称其为“一门帝国科学”，这门科学为其他社会学科在学术丛林里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他充满敬意地表示，那些“肩负使命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常常是在与对他们满怀忧虑及敌意的国人的对抗中进行的”。

然而，在这条通向加冕的路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斯蒂格勒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的1/4个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发现，经济学从别的学科领域学习到的其实和它能教给它们的一样多。当今，行为金融学通过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去理解金融市场。公司丑闻和贪婪导致的经济危机呼吁将道德引入经济学。甚至于在过去十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一度颁与一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见《金融与发展》2009年9月号）以及一名政治学家，艾里诺·奥斯特姆。

这样的发展或许会使乔治·斯蒂格勒感到沮丧，但另一位与他同名的学者，乔治·阿克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不会。后者表示，其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就是将宏观经济学植根于“全面的人类情感与行为之上：公平、信心、贪欲、认同、拖延”（拖延？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个）。

“这是不公平的！”

阿克洛夫讲到，驱动他40多年职业生涯前进最主要的主题是失业。“我一直认为失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事实上，它促使我写出了几乎所有的东西。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收入，通常还失去了人应当实现其被赋予的责任的那份意识。”

为什么会出现失业？阿克洛夫在与著名经济学家

詹妮特·耶伦（他的妻子）的共同研究中发现，公平这个概念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俩利用了社会学来丰富市场上如何发生交换的描述，这当中就包含了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理论指出，交换中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如果某一天在农贸市场卖水果的人多于买水果的，那么水果的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发生了一场意外的暴风雪，那么五金店里的雪锹就会涨价，以应对突然出现的短缺。

但是，“人类可不是这样想的”，阿克洛夫说。研究表明，人们会认为五金店的商品因为一场暴风雪而

“大胆的问题与巧妙的答案把乔治造就成了这样一个成功的反向思维者。”

涨价是一件不公平的事。而当农贸市场中供大于求时，水果也不一定会降价。阿克洛夫认为，在农贸市场买东西的人们通常会想“表明一种态度”，有些买家当看到卖家有困难时会买得比原计划多一些，而有些卖家则会出自“对自己商品品质的骄傲”而拒绝降价，把价格维持在他们觉得“公正”的水平。

这种对于公平的考虑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劳动力交换的价格，即工资，不仅仅依据对劳动力的供与求。雇主不得不考虑到，支付低工资对被雇者产生的精神和效率方面的影响。如果降低一个被雇人员的工资可能会引起他的仇视情绪，打比方说“往汤里吐口水”，这对雇主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因此，雇主通常会愿意支付高于维持供求平衡的薪酬。阿克洛夫和耶伦将之称为“效率工资”，以此来阐释较高的薪酬能使被雇者在工作时更有干劲、效率更高的概念。

雇主做出的这种正确的决定所产生的总量上的结果就是，在一个经济体中总会存在失业，因为薪酬被设定得高于每个人都被雇佣的平均水平。阿克洛夫写道，“劳动力市场于是变得像一场抢椅子的游戏，舞池里的人多于椅子数，当音乐停下，许多人找不到椅子坐”（Akerlof和Shiller，2009年）。

动物精神

阿克洛夫说，试图弄明白失业这一问题，即“在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供应并不总是与需求对等”，也帮他开阔了思路，推而广之想到了“人、组织、市场和资本主义”实际的运作方式。这个创造性的想法反映在他2009年与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合著的《动物精神》（见《金融与发展》2008年12月号）一

书中。该书入围了《金融时报》/高盛商业类年度图书奖。席勒告诉《金融与发展》，两位本来观点相近的作者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益加契合，以至于“我不再能清楚地分辨谁写了哪个部分”。他说，这本书反映了“我们认为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更紧密地联合起来的观点”。

阿克洛夫和席勒指出，在标准宏观经济学中，某些通常不被考虑的力量，比如公平、贪念和信心，不仅对于理解为什么存在失业，同时对于解释为何经济会陷入萧条，为何资本市场如此容易波动，都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特别致力于复兴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信心在经济起伏中所起的作用这个观点，尤其是商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心或者“动物精神”。凯恩斯曾说，“信心程度是务实的人们最关注的事，但经济学家还从未认真分析过这个因素”。

不管是生意上的投资决策，还是家庭有关今天花多少和为将来储蓄多少的选择，都取决于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时刻变化着的对未来能拥有多少的预期。凯恩斯认为，“这种不确定的感觉起伏不定：有时候人们会比其他时候更有信心。当信心增强时，经济繁荣；而当信心削弱时，经济萎缩”。事实上，信心膨胀会引发过度和愚蠢的投资，例如房地产市场的情况。而当这种乐观预期落空时，就可能引起经济的崩溃。当经济下滑时，信心的跌落又可能引起向另一个方向的极端反应，与之相伴的是信用全失和消费者紧缩开支。

阿克洛夫指出，美国1991年的经济衰退就是一个信心重要性的典型范例。他记得在1992年美国经济学会的研讨会上，其间众多著名经济学家梳理了一遍老套的经济衰退的理由。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最好的解释是由奥利弗·布兰查德提出的，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现在是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说，萨达姆·侯赛因发起的对科威特的入侵打击了美国消费者的信心，进而影响了消费支出。“奥利弗的解释很简单，但是却是正确的”，阿克洛夫说，“至少我想不出更合适的理由”。

快乐家园

既然私有经济会随人们情绪变化，政府的角色应当是采取措施来稳定经济。阿克洛夫和席勒说，政府应当像是对经济负有责任的父母，不能太专制也不要太随和。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极具创造性，政府不应该严格到影响它的创造力。但资本主义本身会走极端，政府此时就应当发挥对抗这种过度情况的作用。

因此，当私有经济蓬勃发展时，政府应该防范它的过度亢奋以避免可能的崩溃。当私有经济的信心低

迷时，政府则应该加大公共投资。事实上，凯恩斯曾有个著名的观点，即当私有经济消沉低迷时，政府哪怕是挖条沟再填上，也是值得一试的做法。阿克洛夫认为，“没有必要那样做。政府有很多可以使民众信心增倍的方法”以使经济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政府同时还应该在阻止腐败和掠夺行为方面发挥作用。在阿克洛夫和经济学家保罗·罗默 1993 年合写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婉转而干脆地称之为“抢夺”。这篇文章写于一连串经济危机之后，政府当时不得不对私人投资者留下的巨额债务负责。阿克洛夫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美国，“我们当然受到了储贷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

失业问题是引导他的工作的主要动力。

阿克洛夫和罗默写道，储贷危机这场“悲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监管者隐瞒了问题的严重性，国会强迫他们对那些支持其当选的人和大捐助商们网开一面，而说客们成功地阻止了本应采取的改正措施，直到问题大到殃及到了普通大众。他俩总结说，“现在大家该变聪明了。如果我们能吸取经验教训的话，历史将不会重演。”

不幸的是，自阿克洛夫和罗默撰写其文章以来发生的情形，正如大卫·莱恩哈特在《纽约时报》上写的那样，就像是“‘掠夺’这篇文章的悲伤结尾”。在 21 世纪最初的那几年，丑闻席卷了类似安然这样的许多大公司。次级贷款缺乏监管和公然诈骗是 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大衰退的导火索，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罗默回忆说，他们在 1993 年写完这篇文章时，阿克洛夫曾说，下一个掠夺的目标将是一个叫做“信用衍生品”的不那么透明的小市场。

当被要求总结对政府在过去 30 多年的政策的看法时，阿克洛夫带着明显的批评语气说：“就权且说政府在创造快乐家园时取得了成败参半的结果吧。”

常春藤盟校

在 2001 年的诺贝尔获奖致词中，阿克洛夫在描述他的人生时认为，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基本是幸福的，但这种幸福完全建立在他父亲事业的兴衰上。他记得自己思考“如果父亲丢了工作，家里不敢花钱了，那么别人的父亲也将失去工作等等。那整体经济就会急转直下了”。这种对父亲工作的担忧说明了为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从 12 岁就开始思考失业理论。而 50 年以后，我还在思考同样的课题”。

阿克洛夫在耶鲁大学接受本科教育。他说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的父亲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他的哥哥也在那里读书。除了研修经济学与数学，他同时在为《耶鲁每日新闻》工作。这份报纸“主宰了我的生活”，他这样说道。他努力想使报纸少一些官方喉舌的色彩，能够更多地反映学生的问题与人文兴趣，“我想使它少些沉闷并多些严肃性”。然而，尽管他无比热情地辛勤为之工作，大三的时候，他还是被拒绝进入这份报纸的董事会。

在其诺贝尔获奖致词中，阿克洛夫认为他被拒绝是因为“我不是个关注详细事实的人”。但他对《金融与发展》解释道，“我当时（在致词中）这么说可能会让人产生错误的印象”。他说自己对于“有关的事实”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他的研究的宗旨是对事实进行阐释：“为什么会有失业？为什么人们说自己很难出售他们的房屋？为什么有些人会比较穷？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喜欢拖拖拉拉？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炫耀？为什么整个国家都喜欢炫耀？”

从耶鲁大学毕业以后，阿克洛夫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研。该校拥有许多著名教授，例如罗伯特·索洛（见《金融与发展》2011 年 3 月号），和一大批精英学生，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见《金融与发展》2009 年 12 月号），他后来与阿克洛夫分享了诺贝尔奖。普林斯顿大学的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见《金融与发展》2010 年 12 月号）当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他说，“（乔治）提的总是其他人不会提出的问题。当你正在想只有一个笨蛋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时，他会给出一个极其漂亮的答案，从而改变你的看法……大胆的问题与巧妙的答案把乔治造就成了这样一个成功的反向思维者”。

伯克利纽带

从 1966 年起，阿克洛夫事业的大部分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如同耶鲁大学一样，这里也有着他的家庭传承，他的曾祖父 1873 年毕业于此。2001 年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把奖金捐赠给了该校，“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予了我很好的支持，我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克里斯蒂娜·罗默（他在伯克利的一位教授同仁）说道，“乔治是一个非常和善、慷慨、富有激情并且热爱经济学的人。光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就对这个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教学评价好极了”。席勒说，阿克洛夫像个父亲一样对待他的研究生，“他建议他们在找工作时要表现得友好。他告诉他们，面试你的人将视你为他们的同事，他们希望看到你是个友好的人”。

在专注于学术的同时，阿克洛夫也与政界关系紧密。20 世纪 70 年代，他分别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

员会（CEA）和美联储工作过一年。巴里·奇斯维克，与他同时在CEA工作的一位劳动经济学家，现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系主任。在其诺贝尔获奖致词中，阿克洛夫感谢奇斯维克教会了自己实用经济学。奇斯维克说：“他这么说太客气了，这是个相互学习的过程，我们所有在CEA的人都从乔治身上学到了许多独特的技巧。”他记得阿克洛夫当时致力于青少年失业问题，这不仅是20世纪70年代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乔治担心如果青年们被忽视，一开始就得不到一份好的工作，那么这将会被看作是一个消极的信号，影响他们的一生。”

除了这些阶段性的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的经历，阿克洛夫还与布鲁金斯学会保持着长期的合作。从2010年9月开始，他被聘为IMF研究部的资深常驻专家。布兰查德说：“我们能拥有乔治，这在任何时候都将使我们受益非浅，然而他的重要性在现在尤其突显。目前，IMF在许多方面，从解决失业危机到制定金融规范，都需要创新性思维。”

柠檬

虽然失业问题是引导他工作的主要源泉，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他在1970年写的关于不对等（或者说说不平等）的信息将如何搞垮市场的文章。事实上，如果你玩词汇联想游戏，将经济学博士与“阿克洛夫”组合起来，蹦出来的答案很可能是“柠檬”。因为阿克洛夫曾以二手车市场做过经典举例：在这个市场上，卖家心里很清楚他们的车是辆好车，还是只是个“柠檬”。而买主们最好的猜测是，车的质量只不过是一般平均水平，所以他们只愿意出一般水平的价格来购买。当然，这就导致好车的车主们不愿把车放到二手车市上，继而又降低了二手车市场上车的总体平均水平，于是买主们对这类车的质量就更不抱信心了。结果是，相对比较好的车都卖不出去，而车市就在这恶性循环中崩溃了。

阿克洛夫认为这类问题可以追溯回马贩子的时代：“如果他真愿意卖那匹马，我是不是真想买呢？”然而，信息的不对等存在于大部分的市场上，尤其是金融市场。“（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给了我们许多显而易见的例子。普通大众以为他们在买房子，而没有意识到归根结底他们买的是复杂的衍生品”。

阿克洛夫说，他以二手车为例以使他的文章更容易获得美国读者的认同。但其实这个课题引发他的兴趣是在1967—1968年期间他呆在印度的时候，当时他注意到人们获取贷款非常困难。他将这个例子保留到文章里，与“柠檬原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年人难以获得保险，为什么少数民族难以找到工作等章节

放在一起。事实证明，对当时的学术界来说，他的文章还太过新奇，曾先后被三家主流杂志拒绝，最后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

如今，阿克洛夫在“柠檬”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标杆。而他本人则继续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并在其最近与蕾切尔·克兰顿（当时在马里兰大学供职）合著的《认可经济学》一书中，将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阿克洛夫的儿子罗比也继承了传统。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席勒是他的教授之一）和哈佛大学。他研究的问题包括：为何不同的公司对于腐败及对腐败的容忍程度不同；管理者要怎样提高他们的权威（支付效率工资看来是一种选择）；在冲突文化中什么因素使少数民族孤立多数民族及反过来被孤立；什么因素使两派间的仇视持续不断。

最后

终于要提到关于拖延的事了。阿克洛夫在1991年一篇文章中写道，“拖延和服从”这些习惯能够解释诸如资源滥用和存款不足等现象。

他在文章中讲到自己曾拖拉了八个月才将一箱衣物从印度寄到美国。这箱衣物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来印度访问时留下的。“每天早上……我醒来后都在想，明天该把箱子寄给他了”。回想起这件事，阿克洛夫对《金融与发展》说，“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他可不拖拖拉拉”。

“乔并不真的需要那一箱子的东西。如果我觉得他急需那箱子，他就会带上它的”。■

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的顾问。

参考文献：

Akerlof, George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4, No. 2, pp. 488-500.

——, 1991, "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1, No. 2, pp. 1-19.

——, and Rachel E. Kranton, 2010, *Identity Economics: How Our Identities Shape Our Work, Wages, and Well-Being*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kerlof, George A., and Paul M. Romer, 1993, "Looting: The Economic Underworld of Bankruptcy for Profi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24, No. 2, pp. 1-73.

Akerlof, George A., and Robert J. Shiller, 2009,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kerlof, George A., and Janet Yellen, 1988, "Fairness and Un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o. 2, pp. 44-49.

Leonhardt, David, 2009, "The Looting of America's Coffer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0.